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1990-2003

中国

大

变化

THE GREAT
CHANGE

主编：康健 王健康 何建明

这十三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这十三年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

江泽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0—2003 中国大变化/康健等主编. — 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215-05253-2

I .1990… II .康…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
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687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1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1.25

字数 3336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00 元

本书顾问委员会成员

- 郑 惠** 著名党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孙起孟** 著名政治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肖 克** 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 李 锐** 著名党史学家,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 于光远**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总顾问
- 杜润生**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 刘海藩**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 孙长江** 著名思想史家,原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 丁守和** 著名历史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 刘河人** 著名政治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 方 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证券周刊》主编
- 李 骥** 著名企业家,南京大学博士,银控集团总裁
- 魏玉树** 著名企业家,西肯尼迪大学博士,中创集团总裁
- 何建明** 著名金融家,中信实业银行高级经济师,支行行长,中国科技交流中心(香港)特聘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书编辑委员会成员

- 康 健** 著名经济哲学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常务副总编,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关海庭** 著名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齐海滨**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 谢百三**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 刘林平** 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里昂第三大学博士后,中山大学教授

晓 韦 著名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政府学院教授

庞 慎 著名科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加州大学教授

石 谦 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政治学博士

陈新夏 著名政治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

王健康 著名政治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秘书长

张明明 著名政治学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傅如良 著名政治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教授

甘德安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教授

李述一 著名政治文化学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教授

周 毅 著名生态学家,北京大学博士后,天津大学教授

杨友孝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管理学院副院长

陈志楣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黄书进 著名政治哲学家,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导言 “与时俱进”十三年

1. 中国巨变 跨越历史 13 年

在一个形势极为复杂的时代,中国实现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这是国内外大多数观察家几近一致的结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有的发生在社会形态层面,有的发生在物质生活层面,有的则发生在精神层面,它们交汇在一起,似隐隐风雷,震撼着世界,昭示着这条古老的东方巨龙正在奋起实现其现代腾飞梦想。

中国巨变之一:确立一个重要理论 提出一个重要思想

探寻中国这 13 年发展的思想轨迹,寻找中国不断进步的理论源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并在十五大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对我国各项事业的指导地位;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92 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鲜明地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7 年党的十五大修改了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 20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抉择。

“理论的实现程度,在于理论对现实的满足程度”。邓小平理论这面伟大旗帜在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之所以鲜活光亮、永不褪色,关键在于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风光无限,成为当代世界一道引人入胜的迷人风景。随着时间、实践的推移,这面旗帜永远闪耀着

光辉。

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她不是偏狭固执、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面对《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这些重大变化给执政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江泽民同志集全党的智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集中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指明方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的探索更加深入,认识更加深刻,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更加具体、更加科学全面,它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认真实践“三个代表”,我们党会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会更加兴旺发达。

中国巨变之二:突出一个要务 完成一个跨越

从世界范围看,13 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型社会到小康型社会的历史跨越,当属 90 年代以来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中共中央于 80 年代提出的著名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目标的成功实现,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极为严峻的国际环境的考验,一个是两极格局瓦解后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中占据着有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紧紧扭住一条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牢牢地定位于“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是 90 年代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因。

“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是从 1981 年到 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 1991 年到 20 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87 年,我国提前 3 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1995 年,提前 5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 1997 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 2000

年,我们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

这一历史跨越,使中国在全球综合国力大竞赛中的排位大幅跃升。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9593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近2倍。1990年我国GDP在世界排名第十,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二,到2001年,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六,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位。

与经济总量增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经济结构向合理方向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追求持续、快速、健康、有效益的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1990年至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9.3%,大大高于90年代世界2.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万元产值能耗,2001年则比1990年下降73.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14.8%。

中国巨变之三:把准一个历史阶段 倡导一种时代精神

这13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春江放舟,“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水乳交融,相互促进,互为支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把握更加准确。

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是什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在十五大报告中作了科学、系统而又全面的回答。

这一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基本矛盾、根本任务和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爆发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中国的发展,终于告别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转入脚踏实地的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2002年“5·31”讲话中又鲜明地提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从历史上来看,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往往首先是从思想上的衰落开始的。一个社会的衰落,则往往是以精神的颓废为肇因的。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则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大精神动力。这13年中国的发展之所以不断涌现新思路,改革不断出现新突破,开放不断出现新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始终倡导并保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

中国巨变之四:走出一条改革新路 创立一种经济体制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是中国进入 90 年代以后在改革进程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白和金教授则称之为“人类社会经济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一目标的提出,结束了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改革目标更加清晰而明确,各项改革围绕着这个总目标全面推进,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一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到 2000 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将其标志概括为 4 个方面: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三是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手段日趋完善;四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巨变之五:“引进来”进入一个新阶段 “走出去”呈现一个新势头

从 1990 年中国宣布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起,90 年代以来,中国向世界展现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开放。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用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话说,我国已由有限范围、领域、地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转变为可以多边和双边机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一些数字佐证了石部长的分析:1990 年至 2001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 5 108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3 780 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 96%。目前,全球 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 400 多家在华设立企业,其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就有 200 多家。2001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 1990 年增长 3.4 倍,达到 5098 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 1990 年的第十六位上升到第六位。

与此同时,90 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中国企业开始跨出国门,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颇有成效,如境外投资,据统计,截至 2002 年 6 月底,我

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已达 6 758 家,协议投资总额 132 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 88.8 亿美元。又如投资领域,过去比较多的是境外加工贸易、餐饮业、劳务承包,近年来扩展到资源开发、产品研发、卫星通讯等领域。一些大型企业开始拓展海外经营业务。再比如对外承包,目前我国已进入国际工程承包的世界 10 强,承包方式从分包为主逐步向施工总承包和“咨询—设计—采购—施工”全过程承包转变。到去年底,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997 亿美元。

中国巨变之六:夯实一个经济基础 推动一项关键改革

农业问题从古代起就困扰着人多而平均耕地面积少的中国,90 年代初期,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世界上不少人都对中国是否能养活自己心存疑问。

1996 年以来的 6 年间,中国给了世界一份答卷:从 1996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历史纪录的 1 万亿斤后,连续 4 年都稳定在 1 万亿斤左右。到 90 年代后半期,在正常年景下,我国已具备了年产 5 亿吨以上的粮食生产能力。近年来为缓解粮食供过于求的矛盾,以及出于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各地主动大幅度调减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略有下降,但仍稳定在 9000 亿斤以上。近年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 800 斤左右,粮食储备量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目前中国全社会的粮食结余量在 1 万亿斤左右,相当于 1 年的粮食总产量。

这一答卷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 90 年代以来采取了极富战略眼光的做法,使中国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认为,这包括如 1993 年中央出台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对农民积极性的调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包括科技的进步与应用,如节水灌溉技术、地膜覆盖技术,还有实行多年的种子工程等。

粮食产量跃上新台阶,为解开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又使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将这种变化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种植业结构由以粮食为主转变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全面发展;农业内部结构由以种植业为主转变为种植业和林牧渔业共同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逐步得到发挥。

与此同时,中国对诸项改革中难度最大的国有企业改革施以重药,提出了大型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实行政企分开,促进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提高了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目前,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控制力明显增强。国有经济占 GDP 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到 2001 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 109316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91.4%。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仍来源于国有企业。

中国巨变之七:推进一项大开发 树立一个发展观

90年代以来,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诸多重大战略性举动中,西部大开发备受世界瞩目:一方面,这一战略举措是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实行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延续和完善;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西部边疆的安定和增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1979年至1999年,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低1.4个百分点。1999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为4280元,只有东部地区的40%。据国家西部大开发办公室负责人的介绍,为扭转这种状况,两年多来,国家按“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方针,依托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努力培育经济增长点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国债投资中用于西部的超过国债资金总额的1/3。2000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十大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新开工12个大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2002年计划新开工1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000多亿元,到10月份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盘点西部大开发成就时,已开工11个项目。与此同时,2000年至2001年,国家用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达300多亿元。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全面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博士说,西部大开发从另一方面体现了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一种新发展观,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其战略的提出和具体策略都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前提条件是生态保护,退耕还草还林成为全局的重点。这与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西部开发策略都有本质的区别。这一进步的发展姿态并非突如其来。把“社会发展”列入政府的中心工作,把政府工作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扩展到追求社会全面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上来,即以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为前提,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这是13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首推中国“五年计划”的变迁。李培林说,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我国制定的都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82年第六个五年计划虽然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并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但直到“九五计划”,社会发展的内容才真正充实起来,而“十五计划”中,社会发展的目标非常实在了,与经济目标几乎平分秋色。如控制人口、扩大就业、发展科技教育、提高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生态环境,等等。

中国巨变之八：启动一项国家战略 建设一种先进文化

大
变
化

7

D
B
H

9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两大浪潮在席卷世界之时,也越来越明确地向世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科技和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一核心要素,在90年代被对形势极为敏感的中国领导层转化为一项国家战略——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进入新的世纪,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重要论断。

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和教育投入不断增加。1990年全国研究开发投入为125亿元,2001年为960亿元,10年间增长了6倍多;1990年全国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0.68%,2001年超过1.0%,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到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4368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05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是进行此项指标测算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和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我国成功实施的重点基础研究规划、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国家重点工业试验计划等一系列重大科技行动,硕果累累,特别是在基因测序、载人航天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引起世界瞩目。

在中国的科学和教育春光无限的同时,中国文化同样展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文化事业和文物保护、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成绩显著。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说,这13年,文化战线是空前稳定的。党的文艺方针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双百方针”;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不断的调整、纠偏。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列入了执政思想,中国文化正以五千年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的时代气息,大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中国巨变之九：实践一个伟大构想 昭示一个统一趋势

90年代最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政府顺利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实践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在台湾问题上有力地遏制了台

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香港已回归5年,澳门已回归3年。港澳同胞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对“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投了赞成票——大批在1997年前移居海外的港澳居民,陆续回流,仅香港就达40多万人。

回归后的香港、澳门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尽管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其结构调整正在加速,经济前景依然为国际投资者看好,国际竞争力依然排在世界前列,她依然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航运中心和旅游中心。香港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港澳地区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香港和澳门作为内地经济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而内地广阔的市场、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与香港在经济发展时序上的落差,为香港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既取信世界,同时也昭示世界,更加昭示全球炎黄子孙一种趋势: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统一,是完全行得通的。

中国巨变之十:编织一张安全网络 流动一种社会公平

8

导言【与时俱进】十三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打破旧有体制所设定的利益格局,在这个进程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而受到暂时损害,是改革很难避免的代价。在中国,这种代价最直观,同时也涉及到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下岗者。

但是,这些下岗失业者并没有因为下岗失业而跌入贫困的深渊。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作出了实行“两个确保”、建立三条保障线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使数以千万计的困难群众身受其惠。目前,全国所有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全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张覆盖城镇居民的社会安全保障网基本织就。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指出,一个社会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一个社会在积聚较大的财富之后才有可能做这件事。但我们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就初步建立了三条保障线,这既保证了中国当前各项重大改革实施的社会稳定,更是托举起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制度设计。对此,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社会保障体制的目的是保证一种社会的稳态和静态。中国的社会却日益显示出一种积极的动态。只要你够优秀,农民也能考上国家公务员;只要你合法进城,守法打工,城市就会张开双臂欢迎你;如果你能力不够,如果你想靠以往的业绩吃老本,再体面的职业和饭碗也有可能末在末位淘汰中失去。这些人们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实

D B H

实在在、每日每时都发生着,成为中国社会的正常景观。

李培林指出,中国的社会流动明显加快,是这 13 年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流动不仅发生在地域之间,也发生在阶层与阶层之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自由变化着自己的职业和身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人们从制度的刚性约束中解放出来了,人们开始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自主改变自己的命运。

政府开始重视这种流动的积极意义,很多大城市放宽了政策,对进城就业谋生的农民敞开城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开始了体制松绑。8000 万农民成为了城市的从业者和建设者,成为了城市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享受者。他们每年寄回家的劳务款在 6000 亿元以上。尤其是在 2001 年,全国众多的大城市不约而同地降低城市门槛,广东、浙江、福建等东部发达地区更是领先一步,在全社会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的制度设计正在制定之中,宁波已经开始将之付诸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杭生指出,与人们通过社会流动寻求社会公平相比,中国的各项制度设计正在以保障公平为最高目标。以保证每位公民的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最基本的资源。

中国巨变之十一:确立一种执政理念 建立一种治国制度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历史也让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旦夕解体,使那里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重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顺应这些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新高峰,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新时期的执政要求,如何建好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给出了具体而科学的答案。执政党建党理论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也体现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赵子平将这些变化归纳为:

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把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同党的治国的基本纲领密切联系起来。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治国方略,围绕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提出党的建设总目标;围绕治国的基本纲领、围绕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来进行党的政治建设的大思

路。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努力掌握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

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一批接班人。

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重点内容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多做得民心、顺民意的事实、好事,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不搞违背群众意愿的强迫命令。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消极腐败现象。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从制度上把加强党内监督和加强人民监督结合起来,对权力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

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获得成效。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在所有新理念中,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和具体实施,十分重要,也是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影响十分重要的理念。

1997年9月和1999年3月,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目标;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正式载入国家根本大法。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介绍,到现在,我国共有现行法律200多件,国务院制定通过的现行行政法规6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制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8000多件,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立法工作的积极进展,为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础。如今,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几个类别,已经比较齐全,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事、刑事、经济、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基本法律为核心,以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内容的法律框架。

2. 高层决策 激流扬帆 13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格局变动剧烈,世界风云跌宕起伏,和平与发展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中国的应变能力。

90 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的激烈碰撞,转型期特有的矛盾,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个难题,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中国的胆略、智慧和技巧。

青山锁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的发展如滚滚洪流,冲破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一路高歌猛进。在这股奔腾向前的洪流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冷静观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的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治国技巧,激荡出一朵又一朵令人叹为观止的璀璨浪花,为世人,也为后代留下了引人入胜的治国强国的精彩之笔。

大
变
化

11

D
B
H

把握要务:咬定发展不放松

1989 年柏林墙轰然倒塌,苏东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空前低潮,国际反华势力彼此唱和,一时间乌云密布,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险恶的国际环境和巨大压力。当时曾有西方观察家放言:不出 5 年,中国将同苏联一样垮掉。

“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面对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党中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1989 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党中央立足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形势、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1989 年 6 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

始终如一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同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1990年,中央宣布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当年年底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建设》,提出要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全面加快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由此,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89年到1992年短暂的低潮后,1992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勃然奋起。199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13.4%,比1990年的5%高出8个多百分点。

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压力:一种是两极格局瓦解后,国际上有些势力制造了一系列国际事端,如“银河号事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对台军售”,以及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划脚,甚至编造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一类的谎言,其战略意图,是力图让中国分散经济建设的注意力,偏离发展的主线,从而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另一种,是9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潮迭起,发达国家由于握有科技革命的先机和在全球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其发展势头很快,给中国的追赶带来了一种新的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作了准确的判断,认为两极格局瓦解后虽然世界局部动荡不已,但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世界性大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种种挑战,但挑战中蕴藏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巨大机遇。

江泽民同志在90年代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成为90年代中国各项工作的主题。

上下同欲者胜。当举国上下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付诸行动时,任何干扰都无法阻挠中国经济列车的奋然前行。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揭示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把中国的发展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制定了中国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宏伟发展蓝图。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令人振奋的“新三步走”的奋斗目标: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加快了区域协调发展步伐:从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到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布局在新的广阔空间展开。1999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发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西部大开发从此狂飙遽

起。

一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正在形成。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物”的增长,而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已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总揽全局:确立市场改革导向

90年代,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全球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国际化和资源配置世界化。这一趋势促使几乎所有国家——除了那些因战乱而动荡不安、尚无力顾及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

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后,市场化改革取向就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1992年10月,在对市场化改革尚存在不同认识的情况下,党中央准确地把握住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果断地采取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性举措,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我国的所有改革任务和力量全部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旗下集结。

正如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白和金教授所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人类社会经济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成功的先例,全靠我们自己一步步去摸索创新”。

全面的改革需要全面的规划。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总体规划,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勇气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意志、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总方针。

1995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进行了科学描述,并指出,按照我们的计划,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再经过20年的努力,在各方面可以形成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把握,使以体制创新为特点的中国新一轮的改革进入了一个理性自觉的境界:各项改革全面配套、稳步推进,既保证了改革的力度,又保持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还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真正达到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